



聊斋志异名篇赏析

卢 今



聊斋志异名篇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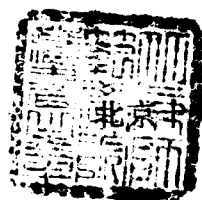
卢 今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5414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105414

内 容 提 要

《聊斋志异名篇赏析》，从《聊斋志异》中精选出二十七篇小说，分为揭露社会政治黑暗、针砭科举制度弊端、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其他题材四类，逐篇注释，并从思想上、艺术上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思想分析上，紧紧抓住蒲松龄“孤愤”这一特点；艺术分析上，或展开情节艺术探胜，或从构思技巧方面入手，或揭示人物形象创造的特色，娓娓而谈，雅俗共赏。文笔质朴生动，议论精当得体，有些见解颇具独创性。综合起来，可以对《聊斋志异》获得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本书适合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阅读，对文学研究者、爱好者也有一定参考作用。

聊 斋 志 异 名 篇 赏 析

liáo zhāi zhì yì míng piān shǎng xī

卢 今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165,000字

1987年3月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

书号: 10326·143 定价: 2.05元

ISBN7-5302-0008-9/I·9

前 言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一部别具异采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从问世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的许多优秀篇章已被译成多种外文，蜚声海外，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而渐趋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因在科举上不得志，弃儒经商。蒲松龄青少年时期，家道已完全衰败。十九岁应童子试，成为秀才，但此后却屡试不中。三十一岁时，外出做了一年幕僚；此后，就一直在乡间做私塾先生，过着清寒的生活。

科举上的失意，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的贫苦潦倒，使得蒲松龄对下层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了解他们的苦难和愿望，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命运，同时，也使得他对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封建社会的弊端的认识不断深化。他在《与韩樾老定州书》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表现了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慨。

蒲松龄不满于时政和社会黑暗，在他的作品中自然要表露出来。但是，在他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里，文字狱极为严

酷，他不可能无所顾忌地倾泻自己的满腔不平，于是，他采取了谈狐说鬼的方式，把对政治黑暗的“孤愤”和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借助于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聊斋》故事中多狐鬼花妖，当然与作者接受了民间文学和古代志怪小说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聊斋志异》从写作开始，几经增补、修订，前后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才最后完成，它是蒲松龄长期艰苦劳动的艺术结晶。这部著作，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余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多数篇章都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但也无庸讳言，其中也有糟粕。总的说来，它是我国人民的一份十分值得珍视的、宝贵的艺术财富。

《聊斋志异》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封建社会的世情面相，其中具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是下述三类作品：一是揭露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的；一是针砭科举弊端的；一是反映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上的自主要求的。

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最集中地表现在官场的腐败上。那里公道不伸，官官相卫，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席方平》里的那个富室羊某，与阴司相勾结，迫害席父。小说以席方平到阴间地府去替父伸冤为线索，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官场的极端黑暗。阴间地府里的那套政权机构，其实就影射着人间的官僚统治。在封建时代的衙门里，总是把“为民作主”的明镜高悬在厅堂之上，借以欺骗百姓，使他们以为官员真是主持正义的，于是，有了冤苦便到那里去告状。席方平也是如此。在地府里，他先告到城隍那里，城隍是个受了贿赂的脏

官，根本不为席方平作主；席方平不肯甘休，又告到郡司去，郡司与城隍官官相护，反倒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他一顿板子，把案子又批回到城隍那里；席方平仍不死心，干脆跑到冥间的最高统治者阎王那里去喊冤投诉。这回他一不做二不休，不仅告羊某，同时将城隍、郡司也一并告发了。谁知阎王殿里更黑暗。在那里，阎王对席方平施加了最残酷的毒刑。就这样，席方平由下而上、由低到高地循着封建官衙的顺序逐级上告，结果，愈告愈受迫害，愈告冤苦愈深，使他“忿气无所复加”。小说通过席方平反复诉讼的过程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府的腐败，以及它与广大受压迫人民完全处于对立状态的矛盾实质。《促织》直接描写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它所写的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书生成名为了缴纳供皇帝玩乐的蟋蟀而招致家破人亡的惨剧。从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由里胥到县令、再由县令到抚军直至皇帝，他们所构成的那个专制统治的罗网，是何等的森严、黑暗，在这张罗网下，悍吏横行，贪官暴虐，无辜百姓却辗转于死亡线上，备受盘剥、摧残。只因为皇帝要寻欢作乐，竟至平民百姓每每为了上贡一头蟋蟀而弄得倾家荡产！《梦狼》也是揭露封建吏治的力作。小说犀利地刻画了官运亨通的白甲的所作所为。白甲衙中，“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这，虽是白父梦中所见，但这正是封建官府的象征性的艺术写照！无怪乎蒲松龄在“异史氏”的评述中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称封建官吏为虎狼，这是蒲松龄对于封建吏治的本质的深刻认识。

地主豪绅的飞扬跋扈，在封建社会里无时不在威胁着广

大人民，这也是政治黑暗的突出表现。在《聊斋志异》中，这方面的描写就更多了。《红玉》里的男主人公冯相如是个穷书生，他娶卫女为妻，这对善良的青年夫妇恩爱度日，勤俭本分，谁知却有横祸不期而至：乡间有个姓宋的豪绅，见卫女有几分姿色，就非要将她霸为己有不可，“诱以重赂”未成，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派爪牙去强抢，为此公然打伤了冯相如父子，哄然而去。《窦氏》中的地主南三复也是个玩弄民女的禽兽，农家姑娘窦女被其奸骗怀孕之后，他不仅矢口否认自己的罪恶勾当，而且把窦女逼上了走投无路的绝境，窦女最后彻夜“倚户悲啼”，抱着南三复的私生子僵死在南宅门外，死得异常凄惨。地主豪绅仗势欺人，鱼肉百姓，作恶多端。这在《金和尚》、《石清虚》等篇里都有鲜明的揭露。

地主豪绅为什么敢于这样为非作歹呢？小说用真实的描写告诉读者：那是由于广大人民完全处于无权状态的缘故。封建政权是为地主阶级效劳的，是豪绅地主们的后台。安分守己的冯相如无端受欺，被豪绅害得家破人亡，他曾经向官府告状，从县衙门告起，“上至督抚”，但是毫无结果；当豪绅被一位侠客杀死后，官府却想当然地把冯相如当凶手抓了去。窦女死于南三复的迫害，惨绝人寰，窦父也曾告官，可是官府受了贿，南三复逍遥法外，他也无可奈何。

百姓遭受的灾难是这样的深重，反抗复仇，在所必然。为冯相如拔刀相助的，是一位与相如素不相识的侠客；窦女死后，化为复仇的鬼魂，终于置南三复于死地。在这些浪漫主义的艺术描写中，无疑是寄寓着作者的满腔义愤、反映着被压迫人民的愿望的。但使读者倍觉振奋的，还是那些冤民结群而起向统治者讨还血债的动人描写。此类描写，并非

蒲松龄向壁虚构，而是有实际生活为依据的。在《公孙九娘》里，蒲松龄从侧面写到了以于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就实有其事。在《梦狼》里，作者写了一起发生在白甲升迁上任途中的令人拍手称奇的事：白甲刚离开县境不远，就遇到了一伙强“寇”，白甲忙献出他的全部财物，对方却说他们不是为劫财而来，为的是给全县百姓报仇雪恨，于是，砍下了白甲的脑袋，还把他那几个助纣为虐的帮凶也杀了。这里的所谓“寇”，其实就是铤而走险起来造反的冤民。在《续黄粱》里，也有类似的场面描写。在文字狱罗网森严的特定社会条件下，作者只能称冤民为“寇”、“贼”，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关键在于他的艺术倾向性，他显然是把他们当成英雄豪杰来描写的，热情地称赞了他们的义举，并且认为白甲之流被杀是罪所应得的。

封建末世，不仅政治腐败黑暗，为它服务的科举制度也弊端丛生。蒲松龄的科场生涯是辛酸的，他对科举内幕十分熟悉，因而，他对科举弊端的描述，既辛辣又深刻。官员的卑鄙无耻与考生的庸俗灵魂，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考弊司》里的虚肚鬼王供职于阴间衙门，他对选拔人才的事根本不理睬，只知巧立名目搜刮钱财。《司文郎》里写了一个有特殊本领的盲和尚，只要在他跟前把文章烧掉，他便能嗅出它的优劣来。余杭生的文章焚烧时，盲和尚不觉作呕；但余杭生竟然高中。小说借此辛辣地讽刺了试官的不学无术。科举制度对书生们灵魂毒害的严重性，在《王子安》、《苗生》等篇里，都展现得非常生动。王子安等放榜时的精神状态近似癫狂，他时而以为自己高中了，便耀武扬威起来，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时而，自我解嘲一番，因为他又“忽如梦醒”了。这

种“顷刻万绪”的丑态描写，不仅是对士子们的辛辣嘲讽，也有有力地揭露了腐朽的科举制度把书生们的灵魂锈蚀到了何种程度！出现在《苗生》这篇小说里的一群考生，个个都有一股酸腐之气，他们互相背诵考场上所作的八股文章，洋洋自得，彼此吹嘘，恶俗不堪。士子们精神状态如此低下，一旦爬上官位又能怎样呢？《续黄粱》便把其中一个在礼部考试高高得中的士子曾某的未来情状，在他自己的梦境中具象化了。这个曾某当了大官之后，便恣意荼毒百姓，竭力聚敛财富，纵情于声色犬马，最后终于死于冤民刀下。把这类封建官僚与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这些小说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它们反映出科举制度到了蒲松龄生活的那个历史年代，确实已步入末路了。

爱情题材的作品在《聊斋志异》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有许多小说，都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勇于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民主思想，充分地肯定了他们在追求真挚爱情和建立幸福家庭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品德。《鸦头》中的狐女，对于母亲强加于她的卖身命运作了拚死的反抗，宁受挞楚，决不屈服。而当她一旦有了“诚笃可托”的意中人，便大胆追求，甚至主动与之私奔。这在当时是被世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但在作品中却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红玉》中，红玉与冯相如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也是十分动人的。红玉也是一个狐女，她向往人间的幸福生活，主动找穷书生冯相如“与订永好”，在她身上，我们是看不到什么封建礼教的羁绊的。但是，封建势力毕竟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存在，在冯翁的粗暴干涉下，红玉决定忍情离去。这种做法看似反常，其实正是她赤诚之心的

另一种表现，她宁肯自己默默地承受着痛苦，却愿意继续为自己所爱的人尽心。《瑞云》中的爱情描写更明显地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瑞云与贺生追求的是“知己”之爱，他们完全摒弃了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之类的世俗之见。妓女瑞云名噪一时，对达官贵人、富商公子都十分冷淡，唯独对“痴情”的穷书生贺生寄予厚爱，只因当时贺生无力为她赎身，两人未能结为伉俪。后来瑞云得了“奇疾”，变得“丑状如鬼”，贺生却仍不改初衷，为她赎身，娶她为妻。贺生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在讲究富贵门第和以女性为玩物的封建时代里，瑞云与贺生能这样对待爱情，确实是很难得的。

在封建社会里，爱情的悲剧和不幸的婚姻非常普遍，《聊斋志异》中也写得很多。《云翠仙》、《连城》、《晚霞》、《王桂庵》诸篇都是。《云翠仙》中，美丽的少女云翠仙是个聪慧的女子。她的母亲，却见识短浅而又非常固执，她一手包办了女儿的婚姻。从此，云翠仙就跌入了痛苦的深渊。她的丈夫先是呼朋引类，终日饮酒赌博，最后竟然要把云翠仙卖作官妓。这篇小说有力地批判了包办婚姻，而且态度鲜明地否定了“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正是包办婚姻造成了云翠仙的沉重痛苦，险些葬送了她一生的幸福。云翠仙最后不但与她那“无赖子”丈夫一刀两断，并且给了他应有的惩处。《连城》里的乔生和连城是有“知己之爱”的一对情人，但是在他们面前横着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不可逾越的障碍——封建势力，就是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王桂庵》从另一角度揭露了封建时代许多婚姻悲剧的社会原因：那就是妇女毫无社会地位。芸娘婚后随王桂庵北归时骤然投江，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出于王桂庵

的几句戏言，其本质原因却不在这里。在封建时代，大家世族的公子哥儿三妻四妾、玩弄妇女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因而当她听王桂庵说“家中固有妻在”时，就跃身江中。王桂庵的戏言在这里所起的，其实不过是一种触媒的作用，根本原因还是社会制度本身。

爱情婚姻问题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与种种社会问题互相联结在一起的。《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婚姻题材作品，总是把各种社会内容渗透在爱情婚姻的描写中一并展开，在谴责封建势力扼杀爱情幸福、制造家庭悲剧的同时，鞭挞了世俗风习的庸俗，揭露了官绅权势者的跋扈，歌颂了青年男女在追求美好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封建民主思想，这就使得小说具有了更加丰厚的思想内涵。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在文言短篇小说史上，达到了高峰。

蒲松龄是写人物的高手。在《聊斋志异》的优秀篇章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典型性，而且生动、个性化。除了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外，他还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创造了许多幻化为狐妖鬼魅的艺术形象。这类富于虚幻色彩的角色，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过的那样：“多具人情，和易可亲。”

出色的情节描写是成功地塑造人物的重要保证。蒲松龄驾驭情节的才能，十分出众。人们在读他的小说时，常常为情节的奇幻生动、包孕丰富、撼人心魄而击节赞叹。

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总是包孕着丰富的社会内涵的。如果我们不注目于聂小倩（《聂小倩》里的女主人公）的鬼的身

份,那么,她岂不就是一个身受严重压迫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形象吗?她曾“历役贱务”,但这并不是她所愿意的。为了摆脱“妖物威胁”的处境,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了抗争,并且终于摆脱了它的控制。作品的后半部分情节,写她来到宁采臣家以后的情况。宁母曾对她有所疑惧,她便代操劳务,事奉宁母处处都十分周到,突出地表现了无依弱女的卑微、善良和勤劳。在封建社会中,象她这样被损害、被侮辱而又不甘心于奴隶地位的下层妇女何止千万!聂小倩形象的典型意义是很显然的。窦女(《窦氏》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由她生前和死后两部分有机地组成。生前,她是一个纯真幼稚的农村姑娘,遭到地主南三复的蹂躏而死于非命;化为鬼魂之后,作品中展开了一系列奇幻的情节来表现她的复仇意志,她缠住仇人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从社会内涵上来说,这个艺术形象既具有揭露地主阶级荒淫无耻和残忍毒辣的一面,又有着表现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复仇精神的一面。作为人的窦女和幻化为鬼的窦女是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的。无数遭到权势者迫害的下层百姓,不都是由忍无可忍而走向反抗复仇的吗?

蒲松龄善于选用精当的情节来维妙维肖地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善于在矛盾冲突尖锐的情节高潮中刻画人物的精神品质,也擅长于运用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促织》在“虫毙”之后,有一段对成名的内心情绪的描写,十分传神。成名得知儿子扑毙了小虫之后,顿时“如被冰雪”,随之却闻儿惧自尽,又“呼抢欲绝”;儿子复苏后,他“心稍慰”;转眼看到蟋蟀盆空空的,便又“气断声吞”了,不再去想儿子的事。短时间里这种种心理状态的变化,作者都

把握得准确而有分寸，描写得处处恰如其分。

《娇娜》中写孔生，文已过半，一直是平平写来，无非是皇甫公子一家对他的厚遇和他婚后生活的美满、幸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一日，公子有忧色”，并问孔生：“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笔锋陡然一转，孔生被置于矛盾冲突尖锐的情节高潮中了：原来，皇甫公子一家是狐类，即将遭到雷击之灾，除非孔生能执剑于门外，遇雷霆轰击而不动，否则他们就在劫难逃了。孔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皇甫公子的要求。当霹雳撼动山岳，老树被狂风拔起时，“生目眩耳聋，屹不少动。忽于繁烟黑絮之中，见一鬼物，利喙长爪，自穴攫一人出，随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娇娜。乃急跃离地，以剑击之，随手堕落。忽而崩雷暴作，生仆，遂毙。”通过这段与邪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的撼人心魄的情节描写，孔生与朋友肝胆相照的赤诚心地，勇毅果敢的自我牺牲精神一下子就突出出来了。无怪乎清人冯镇峦在评点时称赞这段情节描写其“笔力”可以与《史记》中的“荆轲刺秦王”相比美。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突现人物性格，《席方平》中也运用得很成功。可以这样说，如果去掉席方平在阎王殿里身临火床而不惧、面对锯身之刑而仍毫不屈服的描写，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就会逊色多了。

《聊斋志异》中虽多鬼魅狐妖，但作者总是把人间社会作为这些“异类”的活动基地，附丽在这些形象上的艺术描写有两种情况：多数都具有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也有的则让人感到“鹤突”，显示着鬼魅狐妖的特点。这类艺术形象，有着“人”与“异类”的双重性。作者所强调的，是他们身上的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属性，但又不忘记根据作品总体构思的需要对其“异类”特点作适度的描写。这就使得这类艺术形象具有

了其它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没有的独特艺术魅力。《武孝廉》中的那个狐仙，她的思想感情显然是“人化”了的。在石某病危时，她对他体贴入微，并用丸药为他治病。两人终于结为配偶。石某病愈，入都钻营做了官以后，另娶新妇，遗弃了她。她得知后，一方面对石某痛加斥责，另一方面，却并不怪罪其继妻王氏。这些地方，都表现了她的“具人情，通世故”（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论《聊斋》语）。但是，她毕竟不同于常人，作品又巧妙地刻画了她作为“异类”的特点。例如，由于石某曾丧心病狂地加害于她，她决定离他而去，临行前，她向石某索还早先所服的丸药，石某终于“旧症复发”而死。多年前所服的丸药竟能令其“如故”的呕出，这决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所能做到的。在这里，她作为“异类”的特殊本领展露出来了。如果说，她的柔媚和这超人的本领显示了狐仙的特殊性的话，那么，白秋练（《白秋练》中的女主人公）日常饮食中缺了湖水就活不下去，所表现出来的便是一种鱼精的属性，苗生的声音能使“山谷响应”就是虎精本性的一种展现了。蒲松龄对各种虚幻的艺术形象的“异类”特殊性的描写，是因物而异，各篇不一，而又无不恰到好处。《聊斋志异》中的那些超现实的虚幻人物就是这样：既具有给人以“和易可亲”，“忘为异类”的特点，在某些场合下，却又会出现“鹤突”的现象。与此相联系，它的情节也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既有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又有虚幻的、超现实的事件，两者互为因果地交融成为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

《聊斋志异》在艺术构思上很注意不落俗套，这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小翠》写的是一个狐精报恩的故事。王太常儿时曾在无意中救过一只母狐，过了许多年，母狐让自己的女儿

小翠嫁给了王太常的儿子。小翠来到王家之后，不仅帮助王太常在官场的倾轧中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还治好了他儿子的白痴病。故事如果只是一味写报恩，那就很平庸了。蒲松龄出其不意地安排了小翠失手打碎玉瓶而遭“交口唾骂”的事件，于是故事情节发生了逆转，变成了暴露王太常的无情无义。小翠出走前对王太常夫妇痛加斥责。有恩报恩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了：“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份体面的大官僚，却简直是以怨报德。作品的题旨随之也就越出了“知恩必报”的樊篱。蒲松龄在艺术构思上力求不落俗套，从而使得作品多具新颖之感，主题思想也得到了纵深的开掘。《梦狼》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白甲由于作恶多端而自取杀身之祸，不过，这样的艺术处理在古典小说中，已数见不鲜。使人耳目一新的是，蒲松龄笔下的这个贪官虐吏身首分家之后，却又出现了神人歪续其头的异事。这真是神来之笔。白甲被救活了，但这种活受罪其实是比处死更重的惩罚。作者的原意在“异史氏”的评述里说得很清楚，是要借此儆示官吏做事“自顾其后”，但给读者更强烈的感受的，是为恶人受到此等怪绝的惩罚而称快。

蒲松龄在艺术构思上出手不凡，还表现在他的作品情节安排意味深长，使人读过小说之后，往往要反复寻味。例如，《石清虚》的艺术构思是围绕着邢云飞的那块珍奇的石头及其主人的命运而展开的。这块石头来到世上之后，屡遭劫难，势豪来抢，窃贼来偷，尚书某为了得到它，甚至不惜诬人下狱；邢云飞死后，这块陪葬的石头仍不得安生，于是，在一次官吏企图从盗墓贼那里把它夺归己有时，它干脆神奇地自毁了。石头自毁的奇迹是发人深思的。它喻示人们，在这个

黑暗的世界里，是容不得任何美好的事物存身的。在《婴宁》中，作者反复渲染这位美丽的少女的爱笑成性，也是有深意的。她原先生活在一个山花烂漫、生气盎然的山村里，这里远离尘世，鬼母将她抚养长大，从未受到过三从四德之类封建礼教的毒害，也没有遭到过污浊的社会世情的浸染。她初嫁到王子服家时，还保持着她的爱笑的天性。但是到后来，她终于变了，变得笑不出来了。这自然不是她故意如此，而是环境使然。那么，这使她“矢不复笑”的，该是怎样的一种世态，怎样的一种社会呵！再如《促织》，作者是把成名及其一家的祸福和蟋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展开艺术构思的。捕到一头“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俊健蟋蟀，成名全家居然“举家庆贺”；而当这头蟋蟀被成子发盆扑毙，九岁的成子竟会吓得投井自尽！这岂不是虫的价值远过于人吗？在官府向成名追缴蟋蟀时，成名不仅肉体上备受挞楚之苦，精神上也遭到了百般折磨，以至“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而在上缴了一头机敏善斗的蟋蟀之后，他很快地就改变了社会地位：先是免去差役，成为秀才，继而受到了厚赏，不几年，他家便一跃成为有上百顷的田地、数以千计的牛羊和拥有高楼大厦的富贵人家了。就是这样：成名一家的命运与蟋蟀有着如此密切的因果关系。百姓的身世浮沉，为什么竟会维系在一头蟋蟀上呢？这不能不牵动读者的思绪，引起人们对社会的深入思考：这是怎样的人世啊！

《聊斋志异》的主导思想是进步的、积极的。但是，毋庸讳言，它也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封建性糟粕。一方面，这是蒲松龄世界观中消极面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代的局

限。本书是个选本，入选的都是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尽管如此，在不少篇什中，也仍然明显地打着封建落后思想的印记：在有的作品中，蒲松龄把清官写成了救世主；又有些作品，在妇女观方面存在着不健康的倾向；《聊斋志异》中确实有一些针砭科举弊端的力作，但有时，作者又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对于通过科举阶梯获得荣华富贵的艳羨；还有一些篇章，宣扬了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观念。

《席方平》对一整套封建官僚机构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在揭露官场黑暗方面，是很有思想深度的。但它最后却并不以席方平的悲剧告终，席方平居然战胜了地府的官僚机构。原来二郎神的一纸裁决就轻易地扫荡了地府里整个暴虐不公的黑暗吏治。二郎神和《胭脂》里的施学使一样，是清官的形象。作品里这类情节安排，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象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依靠官府主持公道这条路也还是走得通的。而这，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中，《连城》是很突出的一篇。乔生与连城在“知己之爱”的基础上，终于结成佳偶，但作者又以赞赏的笔调，描写了那个在冥府里相识的女鬼宾娘还阳后也嫁给了乔生；《聂小倩》里，那个品行端正的宁采臣在和聂小倩结合之后，也是既金榜题名又纳美妾。蒲松龄一方面主张爱情的忠贞、“痴情”，又艳羨于一夫多妻，这种互相矛盾的思想状态使得他的有些作品，呈现出了不协调的色彩。

蒲松龄虽然对科举制度多所针砭，但在他笔下正面人物中举进爵者却并不少见。他常常将这作为对好人的一种奖赏。《红玉》中的冯相如、《聂小倩》中的宁采臣后来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且家业大振。这种报偿，有的还延及后代。他对